

浦江清文存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张耀宗 选编

浦江清

惟此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祀

與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
国学
书系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浦江清文存

PUJIANGQING WENCUN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张耀宗 选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浦江清文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张耀宗选
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2
(清华国学书系)
ISBN 978-7-214-17169-6

I. ①浦… II. ①清… ②张… III. ①中国文学—古
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8144 号

书 名 浦江清文存

主 编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选 编 张耀宗

责 任 编 辑 许尔兵

装 帧 设 计 姜 嵩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7.75 插页 2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7169-6

定 价 5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遗产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

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桢、吴其昌、高亨、刘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

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2年3月16日

浦江清的生平与学术

在学术的历史上永远有那样一些人，他们以时间换取了空间。他们的声名在后世寂寂，但是绝不借助于“被遗忘”的抒情式的历史感伤重回当下，而是坚硬地以其学术本身的层层深入的思致和问题意识去与当下的学术研究产生对话，甚至竞争。1926年开始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的浦江清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

浦江清，1904年12月26日出生于当时的江苏省松江县。他家境贫寒，他的父亲浦嘉乐，“先做帽子手工业批发生意，后在松江县立布厂当职员”。尽管如此，浦江清还是接受了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他读完一年的私塾以后，就于1912年进入松江县立第二初等小学成了二年级的插班生，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初小、高小，1918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江苏省立第三中学。1922年9月至1926年7月，浦江清先生在东南大学读西洋文学。1926年8月，经吴宓介绍，他来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成为陈寅恪的助教，那年他才21岁。当时经由吴宓还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几位导师的奋力开拓，清华国学初具规模。此后除了由于战乱、探亲、游学在外，他基本没有离开过清华大学，直到1952年10月，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院系调整他调至北京大学。1957年8月31日离世。

浦江清的一生虽然没有留下学术专著,但如果认真研读他残存的日记,我们就可以发现,浦江清是一位心灵易感、非常勤奋刻苦又具有非常好的学术训练的学者,因为战乱不断,不断迁徙、病体支离,很难有一个安静的书桌让他在年轻时代创造力非常活跃的时候,专心于他所期待完成的关于中国文学史专著。他的朋友施蛰存曾说:“在昆明的时候,我曾当面批评他:‘太懒于写文章,太勤于吹笛子、唱昆曲。’他说:‘写文章伤神,吹笛子、唱昆曲,可以怡情养性。’我对他无可奈何,总觉得他有许多该写而没有写的文章。”^①我想这不是浦江清的“玩物丧志”,而是外在的各种原因导致他心情的浮动,“吹笛子、唱昆曲”是兴趣、是寄托,也是对现实世界的慰藉。即便如此浦江清仍然留下了许多极为重要的学术论文、书评以及讲义等。

浦江清的日记不仅仅是他日常生活的简单流水账,而且透露出许多值得注意的信息,例如他的阅读史,特别是他的英文阅读史,从那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年代中某一种类型的学者对于西学所关注的深度和广度。例如,1928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写他关于英国诗人威廉·沃森诗集的感受:“余喜其《威至浮斯之墓》及其短诗数首。其关于政治社会问题,则不特吾侪外国人读之不能判断其思想感情之是非,且就诗而论,亦鲜有佳者。吾人在杜、苏集中,并不讨厌其议论时事之作,而此种情形发现在英国诗人中则极不耐烦。何偏见若是耶!”^②这些记录在浦江清于清华早年工作时期很是常见,正是他的西洋文学的功底,同时对传统文学的专研使得他的学术训练和学术方向上和清华国学的学术风格能够保持一致。虽然后来者可以在许多具体的学术议题上超迈前者,但是这种特别的中西通融的学术风格的确是在此时规模初具的。

生活史与学术史之间的互动在浦江清的身上体现得也很明显,这一点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戏曲上。浦江清非常钟情昆曲,在一次听完昆曲之

① 施蛰存:《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序》,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页。

后,他回来在日记里面记录道:“距今约百年前,在北京,秦腔征服昆曲,皮簧又征服秦腔,为中国戏曲史上重大之变迁。……皮簧不但词句鄙俚,不堪入耳,而且分场之拙劣,情节之不通,使我国戏曲又退回到关汉卿、王实甫前一二百年。”^①至于从院本到杂剧再到传奇,他认为这种发展在组织结构上是进化的,但是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演出实践中的问题,并且有可能导致了昆曲的衰落:“然至传奇盛行,往往一本多至数十出,势不能全演,于是每择其精彩数出演之。结果伶工相传,某剧只能演某某几出而已,全本之谱,或始存后亡,或起初即不完备。”^②这种实践中的学术对于浦江清的文学史观无疑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使得他不会简单接受胡适的文学史进化论的历史观,而是在中西的比较中去理解各自的合理脉络。有一次浦江清受邀去看歌剧《浮士德》,虽然因为不懂德文,他自觉好处不能领略,但是不妨碍他从中西戏剧比较的角度发表一些对此剧的观感:“西洋戏剧究属是现实的,所以如易卜生一类的话剧当然西洋人演得好;但是搬演古事,演传奇、传说或历史剧,则中国剧艺进步。中国剧的艺术使古人的生活举动都理想化了,美化了。戏台上的人物和戏台下的观众,举动笑貌,全然不同。……总之,庄严的、伟大的、美妙的历史剧,恐怕还得推中国剧。我看了外国戏,反倒认识中国剧在世界的地位。”^③所以,我们不能忽略生活史对于学术史的影响,因为无论是道德还是文学,只要在现实中依然是鲜活的,依然是生动的,那么对于一位喜爱或者认同它的人来说,就可以超越许多繁琐的学术论证而成为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后人看来或者嫌其论理之不足,但是因为它依托于曾经的现实,所以也自有其独到的历史厚度。相反,如果缺少了躬行或者社会的真实氛围,即便是学术争论或者是复杂的学理说明,也有可能是抽象的,因为它只是抽象的论证而未曾真实地成为思想与社会的碰撞。这种碰撞的深度来自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碰撞,而非观念与观念的碰撞。

①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页。

② 同上书,第27页。

③ 同上书,第48—49页。

从这一点来看,这正是那一代学者在总体气象上超越我们之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学术真实地介入到社会实践中的深度可能要超越我们。

前文说到浦江清有很好的现代学术的训练,这应该是浦江清学术生涯里面一个非常具有关节性的问题。在东南大学西方文学的训练以及和吴宓、陈寅恪的交往,极大地塑造了浦江清独到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史研究的路数。浦江清能够从南京到北京,这对他一生的学术发展和人生计划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帮助他进行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就是“好人”吴宓。吴宓虽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没有特别重要的学术著作,但是随着他的日记和书信的公布,我们对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可以说他是一位忠恳认真,性格率真的好老师。杨绛回忆吴宓时说:“锺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成了众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①这的确是一个贴切的描述。在浦江清现存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吴宓和他之间的密切往来。私人的情感在浦江清和吴宓的私人交往记录中的确是一个具有兴味的话题。他们都特别喜欢在日记和书信中将情感放置在“理智与情感”的天平上来回衡量。例如,《浦江清日记》1930年12月26日记录道:“仰贤批评说,吴先生是最好的教授,但是没有资格做父亲,亦没有资格做丈夫。这使我们都寒心,因为在座诸人都知道,吴在英国,用电报快信与在美国的毛彦文女士来往交涉,他们的感情已决裂了,吴现在唯

① 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文汇报》,1998年5月14日。

一希望在得到仰贤的爱,而仰贤的态度如此,恐怕将来要闹成悲剧。”^①如果说在学术上浦江清和吴宓一样都渗透着对于中西的思考,那么在生活中,浦江清和吴宓的对话间对于中西异同的思考也无处不在。浦江清在给妻子张企罗的信中说:“从前你觉得清华的人思想有点洋化,洋化是好的。受过西洋文学熏陶的人,对于婚姻和爱情是认真的,不乱来。”这种现代人情感的文化政治的表达在私人的通信中显得非常的生动和真实。

吴宓和浦江清在通信中经常讲中西的比较问题未必寻求在学理上的深刻论证而求之在生活中的感性联系和表达。吴宓在给浦江清的信中说:“我所倾慕崇拜喜悦之西洋,乃是理想中,过去的(历史上的)西洋,即如理想的天主教,希腊哲学,spirit of gentleman, spirit of chivalry 以及文学艺术等,只可于书本中、博物院中,及自然人造之风景建筑物中得之者。至于实际之西洋,身心所接触之西洋,如同火锅,实不堪一日居,远不如中国,更勿言清华。科学发明,人生益烦闷,现各国惟事制造战具及促进航空。而一社会中,每人各度机械之生活;其精神如蜂巢,各不相谋。除办事应酬外,至晚各归其室,大楼六七层乃或三四层,每层十馀室,每室一人,静伏其中,同居者经年不交谈一语——此种生活组织,快乐何存?”^②浦江清也时常有对中西文化的侃侃而谈:“心一与余意见多相同。如谓西洋诗歌小说皆已到绝境。欧洲之工业革命只增加人类之痛苦,未丝毫增加快乐。工业立国非到资本主义不可,非到殖民地政策帝国主义政策不可。结果世界大战随时可发,此乃西洋文化走入歧途也。”^③吴宓和浦江清虽然可能都受到“一战”前后“西方的没落”的文明论的影响,但是更多的是他们时常沉浸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去丰富和发挥那些文明论的枝叶。这也形成了他们在对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一大特色,论断往往简单明了,经验却很丰富。在这里可资对照的或许可以是清华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梁启超,梁启超 1919 年完成的《欧游心影录》是一

①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版,第 38 页。

② 《吴宓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 173 页。

③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版,第 70 页。

次中西文化的感性表达和理性交织的表达,同样参杂着自身独特的对于中西文化的生命体验,但是表达出来的方式却不一样,正如刘东先生对于晚年梁启超思想转向的分析:“发人深省的是,借助于长年办报所获得的西学通识,和亲身游历而打下的第一手经验,恐怕再没有别的地方,能像当时寒冷与饥饿的巴黎更适于他的这种思考,以至于蓦然回望,突然对自幼谙熟的本土价值体系,有了充满惊喜的重新发现。而由此一来,他内在的思想动机,也就自然要突破单纯为了民族国家而‘寻富求强’的目标,而上升到了一种面向世界的、承担着人类共同未来的交互文化使命。”^①这种对于彼时落实在公私文本资料中的对于中西理解的层峦叠嶂的不同思致给我们构筑了一个思想的空间,而正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才能逐渐贴近浦江清和他的师友们的思想的“起点”和“坐标”。

和吴宓在生活以及学术上的双重影响不同,陈寅恪对于浦江清的影响主要是学术上的。浦江清在1926年至1928年任陈寅恪的助教,所以在浦江清的日记里面可以不时地读到陈寅恪的一些私谈,例如:“陈寅恪先生云云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是派送留美官费生。”^②浦江清和张荫麟协助吴宓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他们两人都很受陈寅恪的器重。陈寅恪甚至对傅斯年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张君年颇少,所著述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之性质。……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③张荫麟的学术书评和《中国史纲》所构成的一种“新史学”的愿景,当另文阐述之。陈寅恪曾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华聘书,弟已催志希,亦尚(未)得其复音,如清华不再聘浦君,则须改中央研究院,此节乞兄预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华聘

① 刘东:《未竟的后期——〈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刘东、翟奎凤编选《梁启超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②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0页。

③ 《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7页。

书,则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虽未能确定,然总希望志希能继续浦君聘书,免历史语言所多出一份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预备耳。”^①陈寅恪考虑之周详,可见他对浦江清的爱护。浦江清除了在清华国学院特别是清华中文系里有很好的人缘,同时在当时北京的学术圈,像和夏鼐、傅斯年等都有很好的关系。这里面除了他的为人谦虚以及学术风格之外,和陈寅恪应该有相当大的关系。在他的日记里,他还曾特意记下傅斯年对他特别的好感。

浦江清对于汉学、对于东方学的注意主要是受到陈寅恪的影响。浦江清在做陈寅恪助教的时候,帮助陈寅恪编过一册《梵文讲义》,在后来浦江清写作研究报告时候还说:“此间有人藏西人关于汉学及东方学书籍甚多,此类书籍,余已数年不得见。……此门学问尚是十数年前在研究院时受陈先生之熏陶而感兴味者。”

浦江清看似不带价值判断的考证的语文学方法在胡适一派的新学术的笼罩下不显得出奇,反倒颇为平常。完成于1936年的《八仙考》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就是这样的一篇非常典型的代表之作。他所考证的八仙的来龙去脉,大概有点像清人考证笔记中的一个条目,是一种博学的体现,但是我们如果注意一下他这篇文章的一个背景,就会发现这种可能被当作“钁钉之学”而无义理的考证文章不是一个单独的类似于清代考证学的题目,而是蕴含有一种与西方汉学竞争的意思。《八仙考》中浦江清提到了P. Yetts、法国学者伯希和的《理惑论译注》、日本学者佐伯好一郎(Sacki)等国外学者的研究。在与这些国外研究的对话基础之上,浦江清运用丰富的笔记资料对民间传说中的李铁拐、钟离权、张果、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位仙家的形象来源一一考证。他认为张果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人,在中条山隐居,曾经被唐玄宗征为银青光禄大夫。浦江清认为因为讲史的原因,所以在宋代他的事迹为人所乐道,所以被收入八仙。韩湘的来源则是韩愈的侄孙。蓝

①《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16页。

采和的来源则可能是南唐存在着这样一位乞讨的道人，又因北宋时候有其画像所以一直流传下来。此外还有，何仙姑来源于宋仁宗时候永州言休咎的道姑，吕洞宾来源于北宋庆历时候的传说，民间信仰其为真仙。钟离权的来源也差不多是北宋时候和吕洞宾同时的传说。李铁拐的来源则有可能是北宋徽宗时候的刘跛子。最奇特要算是曹国舅，浦江清认为他本无仙迹，但是相貌俊美“或者画八仙庆寿的人随便采他入内”。这些结论得出看似简单，实际上在当时的学术风气中他完全是站在一个风潮之上的。当然，也正因为纯正的语文考证，所以浦江清在这里对其民俗的意义并没有发挥太多，在这一点上他和彼时的如周作人、钟敬文、江绍原等人的民俗学研究的路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浦江清还将大量的精力放置在书评上，他完成了《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评〈小说月报〉第18卷》《牛津英文大字典》《卢冀野五种曲》《评江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评王著〈元词斟律〉》等重要书评。这里面有对当代文学的评论，例如对老舍小说：“十年以前，题小说之名惟恐其不雅，至于今日，则小说之题名惟恐其不俗。譬诸晚唐之诗，竞为风艳，至于宋世，遂尚枯涩，又喜用俗字俗语，以入篇咏，皆未得中庸之道也。‘香钩情眼’等固肉麻可厌，而‘老张的哲学’及‘赵子曰’等亦粗鄙可憎。贾宝玉题袭人之名，人讥其刁钻古怪，抑‘赵子曰’者，粗俗而入于刁钻一路矣。然《赵子曰》之文章，则不若其名之可憎。是篇结构完美，前半以诙谐之笔出之，旨在讽世，后半渐趋严肃，人格之卑鄙者，始一一暴露其真面目，最后以悲壮之暗杀案为结，颇足以激士心。老舍君于叙事之同，间为议论。”有对白话文运动之后，旧文学创作的关注：“中国青年，现肆志于旧诗词者，已不多见，而致力于度曲者，则尤绝无仅有。盖曲有别才，非关学理，而宾白之安插，丑角之打诨，曲调之铺排，阴阳四声之辨析，实较诗词为麻烦，颇不便于初学。”有对西方文学原典的评论，例如对于德国戏剧家兼小说家苏德曼（Hermann Sudermann, 1857—1928）的《忧愁夫人》（*Dame Care*），浦江清写道：“近年来读小说而哭者凡二次。其一读某君所译一俄国小说。时适与某君同居，彼以其姊遭惨祸，震惊

成脑疾。一日忽谓其精神不能自持，欲进城视其母，薄暮命车，偕其弟行。行后大风雨，余独坐无聊，取其所译小说读之。书中叙一薄命之女子至惨。余既怀念某君兄弟，复睹书中悲剧，遂大哭。今读《忧愁夫人》小说，令余堕泪不禁者尤在前半部，盖其有力之描写，实使余联想至余幼年时一二极悲绝哀之事。由此以观，则谓一切文学是否能深感人当视在何种境地有何种经验之人读之而定者非耶。然而非苏德曼之文笔，亦不能使余如此也。”^①这里，浦江清对西方文学原典的关注正好可以和之前我们所提及他的西学“阅读史”构成一个系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浦江清的学术世界的丰富性以及这种阅读结构对之学术风格的影响，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他读书的切入之点，他的一种文类自觉意识和自我情感的摇荡。这些书评的内容丰富，涉及的面向多元，有时候是自己主动兴致幽来之作，有时候是协助吴宓工作的产物，但是这些书评无疑促使浦江清跳出自己的学术范围去面对一个更为广泛的人文世界，让他去以书评的形态构建起自己与其他研究者、创作者之间的“态度”关系和学理联系。

浦江清从东南大学到清华开始自己一生的学术事业和教书育人的事业，一路上虽有战乱和病痛的折磨，但是在学术上他非常典型地体现了那一代学者非常幸运的因子，他有非常好的老师的指点，通过老师的关系进入当时学术界某一顶层的圈子，他在学术上保持着中西对话的姿态，甚至更倾向于在西学的浏览之中去寻找中国的主体性。他为人传统雅正，但是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个体的生活世界中浦江清经常将个人的情感放置在理性的分析之中，这使得他非常矛盾和困惑，但是因为他的善良，这些情感的纠结在理性的书写分析甚至是自我讨论中也逐渐地得到纾解，这些在他的书信和日记中已经多有记载。浦江清的个人的人生经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来看的时候总是最有兴味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对一个阶层的物质经济的考察，作为社会结构的一

^①《近顷逝世之德国戏剧家兼小说家苏德曼评传》，《浦江清文史杂稿》，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个空间层面的梳理,而且还糅合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特的生活世界和学术世界之间关系的探求,正是这种探求的问题之间的张力使得学术的历史变得生动起来。

浦江清在1949年至1952年10月之前依然在清华教书,1952年10月因为院系调整,他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此后的几年中,浦江清替朱自清完成了《宋五家诗钞》、出版了《杜甫诗选》,完成了《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这篇非常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缘起于他1948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楚辞》过程中,如何去理解《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话。这是屈原对于自己生辰日期的陈述,但是对于“摄提”这个天文学的词汇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在这篇论文中浦江清细致地梳理了历来涉及这个问题的文献资料,对天文学上的岁星纪年的问题进行新的解读。这样他从四个方面——论证:(一)岁星纪年和干支纪年的分别,即太岁超辰问题;(二)岁星纪年的原理和它的发展过程的推想;(三)岁星纪年的甲乙两式;(四)岁星摄提和大角摄提的关联作用。最后浦江清关于屈原具体的生辰日期得到了三点结论:“(一)出生的月份是孟春正月,一年的始月。而且这个正月是近于标准的正月,朔日和立春极近,太阴月份和太阳节气相调和,得阴阳之正。(二)出生的年份是当时天文占星家流行应用的岁星纪年法的正年,是十二循环纪年的始年。岁星在天庙,就在他出生的月份正月孟春和太阳同宫会合。如果用《周礼》从月建得太岁辰名的办法,那么这年就是寅年。他生在寅年寅月,月份上有太岁。(三)出生的日子是庚寅,值孟春节气月的中气,雨水。而且也极近于阴历月的中心,望日。”这篇论文在浦江清晚年的学术研究的地位不言自明,它体现出一种现代语文考证的跨学科的深厚学养。近年浦江清先生的女儿发现了浦江清在西南联大时期的一份读书笔记——《乐律与宫调——读书笔记两种》,在这份读书笔记里面展现的是古代音乐史与文学史的交叉视野,这份未及展开的思路在对屈原的研究中以另一种形式得以继续。这两者体现出浦江清在学术上的某种预流,当彼时的语文学意义的研究主要在传统的校勘目录学意义上展开的

时候,他在跨学科的向度上开始努力,这 and 现代学术上对于新史料的运用是一个层面的,他的研究和 20 世纪后半叶日渐成为显学的音乐文学研究和年代学研究形成了呼应。

从 1955 年下半年开始,浦江清的身体急转直下,1957 年 8 月在北戴河逝世。

他的学生季镇淮说:“以 1936 年为界,随着先生在清华教职的转移,先生由中外古今文化历史的评论家,转而为中国文学的考据与研究的学者,这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如果说学生的这句话是浦江清学术研究外部主题变化的纲要,那么他的朋友王季思的这句话则是浦江清学术内部所受影响的精要说明:“他在清华园的前期,学术上深受王国维、陈寅恪两先生的影响,致力于文史考证之学,而在学问途径上则避熟就生,常能于一般学者注意不到之处深入钻研,提出个人的独得之见;后来服膺闻一多、朱自清两先生,主张精读原著,一字不放过,真得作者意旨,然后联系前人有关论著,融会贯通,而出之以平易之笔,使读者时有会心,乐于信从。”^①虽然浦江清先生的学术研究许多是未及展开的话题,只是开了一个头,没有形成最终的系统的思考,但是“书比人长寿”,他已经留下的学术著述和一些未刊的文稿已经足以让我们领略到他学术的风景。

二、浦江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浦江清的学术成绩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另一个是关于国文教学的研究。这两个方面因为浦江清本人教师的角色决定了它们之间肯定会有交叉,但是为了对浦江清的学术有一个透彻详细的介绍,所以在这篇具有导论性质的文字中,我们将这两方面分而论之。

要理解浦江清的学术思路不仅需要将之放置在民国学术的主流中

^①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北京三联书店,第 299 页。